

# 成都十二桥遗址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六

在四川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当中，位于成都市区内的十二桥遗址（如图1所示）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在这处遗址当中发现了大型的商周时期木结构建筑群，还发现了一批有别于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同时期出土遗物的独具时代和地域特征的陶器，为建立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市十二桥街区，东靠西郊河，北靠十二桥路，南倚文化公园。1985年，在兴建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和煤气公司综合大楼的地下室时，在距地表深约4米的地下层中，发现了许多破碎的陶片和大片的圆木构件，从而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随即开展了考古发掘清理。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最令人瞩目的奇观出现在



图1 十二桥遗址

人们的眼前：在遗址中逐渐显露出大型的木结构建筑遗存。这些建筑遗存具有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木结构建筑的特点，采用了在地面铺设圆木结构，形成平面为方形

网格状的布局，圆木结构中有的采用了树立木桩的方法加以固定，有的有两排木桩，有的有三排木桩，共同组成建筑物的基础。在此之上，发现了大片的茅草、小圆竹等倒塌后形成的堆积物（如图2、图3所示），应当是当时房屋的顶部和墙体的遗存物。



图2 建筑遗迹中的茅草堆积



图3 建筑遗迹中的小圆竹堆积

通过这些遗迹现象，考古学者们重现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一处居址，它的总体建筑特点是用圆木制作地梁和地板，用紧紧绑扎在木桩旁边的圆木构件形成居址的居住面，在屋顶上采用茅草、竹子等材料覆盖，形成轻巧、结实、实用的房屋建筑。其中一座编号为F1的房屋遗址，从发现的密集木桩、纵横地梁与地板的分布范围来看，南北宽约7米，东西长约22米，加上外面宽约3米的廊道，可推测此处房屋居址的东西长度达到了25米，其使用的功能很可能与当时社会的社区活动有关。整个建筑遗址的总面积达到1300平方米左右，是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遗址中发现的一处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南方长江上游的史前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十二桥遗址发现的木结构建筑遗迹表明，古蜀先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用打桩法、竹篾绑扎法、榫卯连接法等工程技术，构造出适合于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独特建筑形式，这也可被视为南方地区“干栏式”建筑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新式样。

（下转封三）

(上接封二)

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商周时期的日常器物，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是陶器，器形的特点和同时期成都平原发现的金沙遗址、新一村遗址、方池街遗址等具有共性，以小平底罐、尖底杯、高柄豆、鸟头形器把等为主要器类



图4 小平底罐



图5 高柄豆残件

(如图4、图5、图6所示)。在遗址中还发现有陶纺轮、石制斧凿等工具，有些可能就是用来建筑这处以木结构为特点的居所所用工具。此外，还发现一些可能是用来祭祀的石璋、石璧、卜甲等器物，也有一些小型青铜器出土，如铜镞、刻刀、剑等，都是实用性的工具，没有发现大型的祭祀性质的礼器。考古学者们根据出土陶器的器型，结合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将十二桥遗址的考古学年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商代晚期，约与中原地区的殷墟三、四期相当；晚期可以延伸到西周早期，从而为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考古学序列的建立提供了一处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因此，考古学界也将以这处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遗存命名为“十二桥文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桥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群中，其早期阶段的器物也曾在三星堆遗址第四期中发现，如尖底杯、高柄豆等，表明这是从三星堆文化向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转化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二桥遗址的早期正处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期。十二桥文化和金沙遗址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应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体系，时代上也更为接近。由此，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到由三星堆、金沙和十二桥共同组成的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

对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的多学科考古研究，还提供了观察商周时期成都平原野生动物资源、生态环境以及气候自然条件的许多重要遗迹现象。例如，在十二桥遗址中发现过犀牛的骨骼，说明至少在西周早期成都平原还可能有犀牛生活，当时具有适合犀牛生存的温暖湿润的环境。在十二桥遗址中还发现过亚洲象的顶骨，考古学者们联系到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象牙的情况，推测当时成都平原曾经生活过亚洲象，从而也为寻找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大量象牙的来源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十二桥遗址中发现的家畜有猪、狗、黄牛、马等，可以基本肯定都是人工驯养的家畜。家畜以猪为主，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马骨的发现也很值得关注，目前还不能确认是否也是十二桥先民们驯养的动物。但如果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已经驯养有马的情况推测，十二桥先民能够驯养马作为动力型的家畜，也并非没有可能。总之，结合十二桥周边的成都平原同时期考古遗存综合考察，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成都平原不仅生活着数量众多的各种鹿科动物，甚至还有当地如今早已绝迹的亚洲象和犀牛，说明当时成都平原植被茂盛，气温比现在稍高，雨量更为充沛，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古蜀先民们提供了宜居的栖憩之地和丰富的食物资源，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形成，这些都为成都平原成为后来号称的“天府之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难得的自然条件。

对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的多学科考古研究，还提供了观察商周时期成都平原野生动物资源、生态环境以及气候自然条件的许多重要遗迹现象。例如，在十二桥遗址中发现过犀牛的骨骼，说明至少在西周早期成都平原还可能有犀牛生活，当时具有适合犀牛生存的温暖湿润的环境。在十二桥遗址中还发现过亚洲象的顶骨，考古学者们联系到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象牙的情况，推测当时成都平原曾经生活过亚洲象，从而也为寻找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大量象牙的来源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十二桥遗址中发现的家畜有猪、狗、黄牛、马等，可以基本肯定都是人工驯养的家畜。家畜以猪为主，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马骨的发现也很值得关注，目前还不能确认是否也是十二桥先民们驯养的动物。但如果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已经驯养有马的情况推测，十二桥先民能够驯养马作为动力型的家畜，也并非没有可能。总之，结合十二桥周边的成都平原同时期考古遗存综合考察，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成都平原不仅生活着数量众多的各种鹿科动物，甚至还有当地如今早已绝迹的亚洲象和犀牛，说明当时成都平原植被茂盛，气温比现在稍高，雨量更为充沛，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古蜀先民们提供了宜居的栖憩之地和丰富的食物资源，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形成，这些都为成都平原成为后来号称的“天府之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难得的自然条件。

对十二桥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的多学科考古研究，还提供了观察商周时期成都平原野生动物资源、生态环境以及气候自然条件的许多重要遗迹现象。例如，在十二桥遗址中发现过犀牛的骨骼，说明至少在西周早期成都平原还可能有犀牛生活，当时具有适合犀牛生存的温暖湿润的环境。在十二桥遗址中还发现过亚洲象的顶骨，考古学者们联系到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大量象牙的情况，推测当时成都平原曾经生活过亚洲象，从而也为寻找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大量象牙的来源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十二桥遗址中发现的家畜有猪、狗、黄牛、马等，可以基本肯定都是人工驯养的家畜。家畜以猪为主，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马骨的发现也很值得关注，目前还不能确认是否也是十二桥先民们驯养的动物。但如果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已经驯养有马的情况推测，十二桥先民能够驯养马作为动力型的家畜，也并非没有可能。总之，结合十二桥周边的成都平原同时期考古遗存综合考察，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成都平原不仅生活着数量众多的各种鹿科动物，甚至还有当地如今早已绝迹的亚洲象和犀牛，说明当时成都平原植被茂盛，气温比现在稍高，雨量更为充沛，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古蜀先民们提供了宜居的栖憩之地和丰富的食物资源，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形成，这些都为成都平原成为后来号称的“天府之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难得的自然条件。



图6 鸟头勺把

(作者简介：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